

地方品质赋能新质生产力*——基于创造力人才视角下城市更新机制与路径

Quality of Place Empower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Mechanisms and Pathways of Urban Renewa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reative Talents

黄珺珺 林善浪 HUANG Junpei, LIN Shanlang

摘要 创新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创造力人才是其关键载体。基于创造力人才的就业与生活空间偏好,构建“创造力人才—地方品质—城市更新—新质生产力”的分析框架,系统分析城市更新通过提升地方品质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作用机制。研究认为,创造力人才倾向集聚于具备多元包容文化、高质量公共服务与丰富“第三空间”的高品质城市环境。城市更新应从“物理空间+社会空间”双重维度推进,通过构建创新活力区、打造高黏性第三空间、营造包容文化环境及建设国际化服务社区等路径,实现地方品质提升并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以上海为例,对相关路径进行分析,并提出规划启示。

Abstract Innovation is the core driver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with creative talents serving as the key carri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reative talents, this study construct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creative talent–quality of place–urban renewal–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o examine the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urban renewal enhances quality of place and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creative talents tend to concentrate in high-quality urban environments characterized by cultural diversity, inclusive social atmosphere, high-quality public services, and abundant “third places.” Urban renewal should therefore move beyond physical space transformation toward the integrated renewal of both physical and social spaces. Key strategies include the development of innovation districts, the creation of high-attachment third places, the cultivation of inclusive sociocultural environment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internationally oriented service communities. Taking Shanghai as a case study, this paper further illustrates the practical pathways of these strategies and proposes planning implications for foster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is study provides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urban planning and governance in the context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关键词 创造力人才;新质生产力;地方品质;城市更新

Key words creative talent;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quality of place; urban renewal

文章编号 1673-8985 (2026) 02-0029-06 中图分类号 TU981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11982/j. supr. 20260205

作者简介

黄珺珺

同济大学体育部
助理教授,博士

林善浪 (通信作者)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
05069@tongji.edu.cn

0 引言

发展新质生产力,既是迎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基本路径,也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确保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必然要求。

现有研究多从技术创新、产业体系、制度环境等维度探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路径,认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不仅依赖技术突破^[1]、创新要

素高效配置^[2]、产业结构优化调整^[3],还依赖制度创新的基础作用^[4]。然而,现有研究多停留在宏观层面,对新质生产力的空间载体,尤其是空间实现机制与城市环境支撑条件的相关研究还比较缺乏。同时,城市更新作为城市发展重要手段,其研究重点已由以传统的物质空间改造和土地价值提升为导向^[5],逐步转向功能重构与环境优化。相关研究指出,城市更新不仅可以改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交通网络视角下城市经济韧性及其传染效应的形成机理和优化策略研究”(编号23BJY039)资助。

善空间形态,还能够通过优化公共空间与社会环境,提升城市整体吸引力^{[6]8}。但是,相关研究尚未充分回应创造力人才对生活品质与创新环境的复合需求。这种“环境供给”与“人才需求”之间的错位,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创新要素集聚与新质生产力的形成。

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由工业化向后工业化转型,创造力人才的区位选择逻辑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即由以就业机会为导向,转向以生活品质与城市体验为导向。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开放包容的社会文化环境和丰富多样的城市空间,逐渐成为影响人才流动的重要因素。在这一背景下,地方品质不再只是城市发展的附属条件,而成为吸引创新资源、塑造城市竞争优势的关键变量。

基于上述背景,本文从创造力人才视角出发,围绕以下核心问题展开:地方品质如何通过影响创造力人才集聚,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城市更新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何种作用?围绕此问题,本文构建“创造力人才—地方品质—城市更新—新质生产力”的分析框架,系统分析地方品质的作用机制及其实现路径,并从城市更新视角提出相应的规划启示。

1 创造力人才与新质生产力

1.1 创造力人才的内涵与结构特征

在创新驱动发展背景下,创造力人才逐渐成为新质生产力形成的核心主体。传统生产方式更多依赖从事机械性、重复性工作的普通劳动者,而新质生产力更需要知识密集、技能复合、富有创新精神的新型人才,这类群体通常具备更高层次的学习能力、判断能力与实践能力。我们把超过一般智力、由许多特殊能力组成并创造某种新事物的能力称为创造力,把拥有创造力的个体称为创造力人才^[7]。与传统意义上的人力资本相比,创造力人才不仅需要具有专业知识与技能,更强调创新能力、跨界整合能力及知识创造能力。创造力人才的活动广泛分布于科学研究、技术开发、高端服务与文化创意等领域。

从功能结构看,创造力人才并非同质群

体,而是由不同类型人才构成的复合体系。挪威斯塔万格大学教授阿海姆等把知识类型划分为分析知识、综合知识和符号知识^{[8]441},相应地,创造力人才也分为分析知识型人才、综合知识型人才和符号知识型人才。

(1) 分析知识型人才。分析知识主要服务于科学发现和普适性技术发明,其典型特征在于高度依赖研发活动和标准化、可编码知识的交流。由此可见,分析知识型人才更重视大学、科研机构与产业体系之间的连接程度,以及由此形成的知识网络。

(2) 综合知识型人才。综合知识更多出现在把既有技术和经验转化为新应用的行业中,例如工程制造、先进工业设备、专业机械生产等领域。与之相关的工艺经验、操作诀窍和实践能力,通常难以完全书面化表达,往往需要在互动过程中习得。由此看出,对综合知识型人才而言,非正式知识交流机制和良好的商业生态通常更具吸引力。

(3) 符号知识型人才。符号知识强调对“意义”与“欲望”的塑造,常见于创意设计、品牌传播、时尚文化、影视传媒、音乐出版等行业。因其知识基础与社会文化语境紧密相连,要求符号知识型人才真正进入相应的生活世界,才能准确把握其中的象征意义和审美偏好。

1.2 创造力人才的流动与集聚特征

创造力人才具有较高的流动性。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和地区之间发展差距的扩大,人才的流动性正在提高。有的学者根据知识分子与社会结构、社会体制的关系,把处于政府组织、教育机构、科研机构、媒体组织和国有企业组织中的知识分子称为体制知识分子;把处于非国有单位或个体职业的知识分子称为非体制知识分子;把游离于社会主流体制和现存经济市场之外的知识分子称为反体制知识分子^[9]。后两类知识分子本身是按市场机制配置的,具有高度的流动性,而体制知识分子在社会转型中也出现了大规模的分化,流动性大为增强。随着地区之间、部门之间的人才竞争越来越激

烈,知识分子作为社会“优秀人才”而成为各地区、各部门竞争的主要对象,从体制向非体制、从低收入地区和部门向高收入地区和部门流动。据报道,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08年,辽宁某大学流失204名教授;2014年初至2016年初,吉林某科研院所流失了11位高端人才^[10]。

创造力人才高流动性的结果是人才高度集聚。从全球国家层面看,有学者发现,相较于普通劳动力,创造力人才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中更加活跃,呈现全球性的“中心—外围”格局,主要流向少数发达国家,集中于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少数国家^[11]。在国家内部的不同地区之间,创造力人才流动的结果是集聚在发达地区。在中国,随着国家对创新基础设施投资的增加,创造力人才在地区之间、单位之间的流动进一步增强,呈现“名校聚集”和“东南部聚集”现象^[12]。

1.3 创造力人才与新质生产力形成机制

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主导、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的一种新型生产力形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13]。也就是说,新质生产力本质上是生产力3要素及其组合的变革,更加突出以知识、技术与创造力为核心驱动。就新劳动者而言,新质生产力要求劳动者具备高水平的专业技能和持续的创新能力和通过协作互动而形成集体创造力,如公司创造力、社区创造力、城市创造力等。就新劳动资料而言,除常规机械和计算设备外,还包括以人工智能、VR、AR等为代表的高技术、高精度、智能化装备。就新劳动对象而言,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劳动对象,除了传统物质形态,还涵盖因科技发展而不断被识别和开发的新型自然资源、技术含量更高的材料,以及数据等非实体形态的生产对象。就组合方式而言,不同生产要素不仅要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作用下有效配置,而且要在新技术推动下优化组合比例和协同效应。

创造力人才是新质生产力核心要素的核

心。在生产力3要素中,劳动者是主体,是唯一具有主观能动性的要素,对其他两个要素能够发挥能动作用,不仅创造和使用劳动资料,而且改造劳动对象,在生产力发展中起主导作用。在生产力构成要素中,劳动对象是客体,劳动资料是生产工具,二者的性能和先进程度取决于劳动者创新能力,处于被动地位。正如马克思指出:“为了占有和使用生产资料,我们需要有技术素养的人才,而且需求量很大。”^[14]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创新是第一动力、人才是第一资源”^[15]，“国家科技创新力的根本源泉在于人”^[16]。

新质生产力的形成过程,是一个由人才集聚驱动的动态过程。创造力人才通过知识创造与技术创新,将创新成果逐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从而推动产业发展与经济结构升级。在这一过程中,包括作为知识生产的创新,也包括作为创新成果转化为产品的创业,创造力人才集聚都发挥着关键作用。一方面,高密度人才集聚有助于形成知识溢出效应,提高创新效率;另一方面,不同类型人才之间的互动与协同,有助于实现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应用的链条衔接。

正因如此,创造力人才的流动与集聚,成为影响新质生产力空间分布的关键因素。创新创业活动在空间上呈现出高度集聚特征,甚至比产业更加集聚^[17]。到2024年底,国内有效发明专利最多的10个城市的发明专利数量之和超过234万件,占全国总量的50.0%^[18]。

2 地方品质赋能新质生产力的作用机制

2.1 地方品质的概念内涵与结构维度

地方品质作为影响城市吸引力的重要因素,在创造力人才流动与创新创业活动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不同于传统仅从基础设施或经济条件出发的城市评价视角,地方品质更强调城市在文化、社会与空间层面的综合体验,其核心在于构建一个对创造力人才具有持续吸引力的生活与工作环境^[19]。

从构成要素上看,地方品质并非单一要素,而是由多维度要素共同构成的综合体系。

一是以公共服务为基础的物质环境,包括教育、医疗、交通等,这些要素构成人才生活的基本保障;二是以开放性、多样性与包容性为特征的社会文化环境,这一维度直接影响不同背景人才的融入程度与社会认同;三是以公共空间与城市形态为核心的空间环境,包括街区尺度、公共空间品质和“第三空间”的丰富程度,这些要素在塑造城市体验与促进社会互动方面具有关键作用。人们对城市品质构成要素的需求,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不同而有所差异。过去,人们更多关注城市基础设施等“硬件”设施。随着城市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和城市之间差距的不断缩小,人们对城市“品质”的需求越来越倾向于那些“软件”要素。其中,随着信息技术和现代交通网络的发展,可移动的贸易品越来越容易通过贸易获得,而对不可移动的要素,就需要通过消费者的移动才能得到,如本地服务、历史文化遗迹、自然生态等。

在地方品质构成要素中,那些不可移动的要素属于非贸易品,是公共—私人长期持续集体行动的结果,通过长期累积形成,具有不可复制性^{[20]68}。这些不可复制的非贸易品,就构成城市品质的独特性,是城市竞争优势的核心要素,也是吸引创造力人才集聚的关键因素。佛罗里达指出“地方本身是关键因素”,“场所质量决定了成功社区的灵魂”^{[8]432}。

进一步来看,地方品质具有明显的“体验性”特征,其价值并不完全体现在客观指标上,而更多体现为个体对城市环境的主观感受。这种体验性使地方品质在人才区位选择中发挥重要作用。例如,一些城市通过打造具有独特文化氛围的街区与公共空间,使其不仅成为居住与工作的场所,也成为创造力人才愿意停留与交流的环境。

同时,地方品质具有动态演化特征。其形成既受历史文化积淀的影响,也与城市发展路径密切相关。在城市更新过程中,地方品质往往通过空间改造与功能重构不断被强化或重塑。因此,从动态视角理解地方品质,对于分析其在新质生产力形成中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2.2 地方品质对创造力人才集聚的作用机制

创造力人才集聚在高品质城市,同时创造力人才成为公司区位选择的重要指向,尤其是知识密集型公司,呈现“公司追随人才走,而不是人才追随公司走”的空间特征。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地方品质对创造力人才的吸引力,具体表现在以下4个方面。

(1) 高品质城市为创造力人才创造多元化的就业生态。过去认为,工作机会的丰富程度及薪资水平,是影响创造力人才区位选择的核心因素。然而,现有证据日益表明,创造力人才在择业时更重视与专业发展密切相关的条件,而不仅仅是收入水平,这些条件主要包括学术资源、合作网络、科研设施、资金保障等^[21]。对符号知识型人才而言,在区位选择中往往尤其看重人际互动氛围与文化交流环境,只有那些具有开放性、多样性和包容性的城市,才能吸引各种类型的创造力人才。不同类型人才之间并非简单分工关系,而是通过知识交流与协同互动形成动态网络。这种多类型人才协同机制,是新质生产力区别于传统生产力的重要特征之一。

(2) 高品质城市为创造力人才创造优越的生活空间。创造力人才也有家庭生活,具有一般城市居民的生活需求,需要家庭生活的相关基础设施和服务,包括负担得起的住宅、良好的幼儿园和中小学、便利的生活设施、优质的医院和其他社区设施。高品质城市意味着与家庭生活的相关基础设施和服务更为完善。

(3) 高品质城市为创造力人才提供更具有个性化和品质化特征的生活方式。虽然社会发展不断重塑人们的娱乐方式,但创造力人才依然重视在工作之外保持舒展心境,并追求更具品质感和审美性的休闲生活。旧金山之所以成为全球创新的中心,与其极致的包容性文化与多元化社区紧密相关。一个能够接纳不同文化、肤色和生活方式的城市,才能吸引全球顶尖人才。纽约“硅巷”的强势崛起,离不开曼哈顿高密度的咖啡馆、爵士乐酒吧和口袋公园等第三空间。

(4) 高品质城市适应了创造力人才对人文精神的需求。源远流长的历史文脉和地域性文化底蕴隐含着城市精神特质,是城市真正的“灵魂”,体现了所谓的历史文化“真实性”。与其职业属性相契合,创造力人才往往偏好具有历史感、社区氛围和独特文化风格的城市空间。例如,伦敦国王十字区人工智能总部的集聚,与其深厚的历史文化景观紧密相关,在保留维多利亚时代的煤气罐和粮仓、中央圣马丁艺术学院校舍、古老的运河遗迹等基础上,更新改造形成独特的“赛博朋克”式景观。

2.3 地方品质与新质生产力转化机制

地方品质作用于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一方面是通过促进创造力人才与创新活动集聚,提高创新效率,另一方面是通过促进技术创新到产业的转化,即通过创业活动与产业发展,将技术创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从创新活动看,高品质城市环境通过提升人才密度与互动频率,不仅增强了创新活动的发生概率,提高了技术突破的可能性,而且提高了创新获得效率。根据新经济增长理论,隐性知识溢出和扩散,依赖于个体的面对面交流和互动,是不可替代的途径。虽然社交媒介日益多样化,但基于现实接触所建立的稳定人际联系,仍然是创造力人才十分重视的社会资源。社交空间也是知识共享平台和空间。谷歌、Facebook等高科技巨头的选址,无一例外都避开了传统的CBD,选择便于高频非正式社交、拥有“可步行街道”和丰富夜生活的区域,正是说明了这一点。

从创业活动看,高品质城市环境通过优化空间环境与制度条件,降低了技术转化成本,加快创新成果向产业应用的转化速度。在这一过程中,创业生态与地方品质之间存在密切关联。21世纪初,经济地理学家费尔德曼(M. Feldman)指出,“创业主要是一个区域性事件”,很大程度上受区域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结构等经济社会环境的影响^[22]。尤其是社区环境为初创企业提供了资源、教育、政策等方面支持,对创业成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

用。高品质城市往往能够形成活跃的创业氛围,吸引资本、人才与技术资源共同集聚,从而推动新技术快速实现商业化。例如,硅谷被称为全球最优越的创业生态,是因为斯坦福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持续输送工程师和创业者中的顶级人才;红杉资本、a16z、Kleiner Perkins等风险投资机构高度集中,形成鼓励连续创业、宽容失败的文化;创业者、投资人、技术专家之间形成了高度连接的强大网络效应。

综上所述,这种“创新—创业—产业”的转化链条,是新质生产力形成的重要路径。地方品质通过多层次机制作用于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其核心逻辑可概括为:地方品质→人才吸引与集聚→创新创业活动增强和集聚→新质生产力形成。这一过程不仅体现出地方品质与创新创业之间的协同关系,也表现出明显的循环强化和动态演化特征,既是创新创业活动的基础条件,也是新质生产力形成的重要驱动力。基于这一机制分析,可以进一步引出城市更新在其中的关键作用,即通过空间与环境优化重构地方品质,从而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持续支撑。

3 基于城市更新的实现路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快速发展,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上升到2025年的67.9%,城镇人口达到9.54亿人,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大规模的人口城镇化。预计2028年左右,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将达到70%,即纳瑟姆曲线第2个拐点,之后将进入城镇化后期阶段。城镇化后期阶段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城市普遍的规模扩张阶段将结束,城市之间人口规模分化加速,大部分城镇的人口规模难以像过去那样持续扩大,部分城市甚至出现人口规模收缩,表现为城区人口密度降低和建筑空置率上升。二是城市发展模式从外延扩张转向内涵发展,更加注重已有城市空间的提质增效。这两个特征都决定了新型城镇化新阶段的主题是城市更新^{[20][65]}。在城市更新中,提升地方品质,吸引创造力人才聚集,促进创新创

业活动集聚,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成为今后城市建设和发展的重要任务。

3.1 从空间更新到环境重构,推动城市更新升级

城市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系统,是物理空间、社会空间和符号空间的有机统一^[6]。其中,社会空间涉及城市功能关系和社会互动网络,符号空间代表居民对城市特定意义的感知。符号空间是历史、人文的凝聚,是空间维度上呈现的历史价值,也是可感知、可体验的,如保存完好的历史街区、历史文物、节点和标志物、符号景观等。因此,城市更新不能仅仅停留于建筑的重建或升级,更为关键的是社会关系、人文环境的优化与提升。在老旧小区改造中,不仅要加装电梯,更要腾挪出底层的架空层或废弃锅炉房等,改造成共享书房、社区咖啡馆或创客空间,让物理空间的更新服务于社会关系的重构。激活“剩余空间”,利用高架桥下、老旧小区架空层等众多“边角料”地带,改建为滑板公园、口袋球场或共享办公舱,为年轻创客提供低成本的社交与运动场所。例如,上海通过城市更新探索形成面向创新的空间发展路径,通过张江科学城构建高密度创新集群,通过徐汇滨江推动科技与文化空间融合,通过前滩地区打造国际化社区,从而在不同区域形成差异化发展模式。

3.2 以“生态构建”为核心,打造新型的创新创业活力区

优越的创新创业生态离不开高品质的空间支撑,要通过空间形态创新和空间功能迭代,不断汇聚创造力人才、植入新经济。一是创新空间形态,通过单体建筑的垂直混合、研发—中试近场耦合等方式,解决研发型制造业的技术链和制造链的空间分割问题。奥地利尼德恩多夫工业区BORA将研发、生产和仓储等功能融合在一个功能高度复合的建筑内,实现研发与生产“零距离”,“技术链”与“制造链”高效协同,大幅度缩短新产品从设计到量产的周期。二是打破传统单一功能分

区的空间利用理念,推行“混合用地”模式,建设功能高度混合的中央活动区(CAZ)。西班牙巴塞罗那在老工业区更新中,强制推行“三三制”用地原则,30%用于住宅和绿地,30%用于知识密集型产业,30%用于公共设施,让科学家“下楼就能喝咖啡,上楼就能做实验”,降低了创新的沟通成本。可见,城市更新仅仅局限于城市物理属性是远远不够的,必须通过空间创新,为创新创业生态创造更好的空间环境。

3.3 以深度情感连接,构建高黏性的“第三空间”

第三空间是家(第一空间)和工作场所(第二空间)之外的社交场所,是连接生产和消费之间的互动交流的空间属性。要使第三空间具有吸引力,必须具备社区感和归属感、低门槛的参与感、线上线下融合的体验感,建立人与场之间的深度情感连接。东京的“下北泽”街区就是一个高度复合的“第三空间”,密布着各具特色的古着店、独立书店、小型剧场、Livehouse和咖啡馆。在空间上,狭窄的街道、密密麻麻的小店,营造出一种“寻宝”般的探索乐趣;在内容上,每天都有无数的小型演出、艺术展览和独立放映活动在发生。正是这样的深度情感连接,吸引着一大批热爱艺术、追求个性的年轻人。因此,城市更新要利用历史文化遗存,保护好城市的“毛细血管”,包括背街小巷,保留弄堂、胡同等具有人情味的传统肌理,营造具有“时间厚度”的独特文化磁场。

3.4 营造多元包容的社会文化环境,为多元人才提供安全港湾

城市多样化和宽容性,是吸引和留住不同创造力人才的重要途径。宽容性意味着不同国籍、种族、民族、职业、地位的人群都能够在一个城市中获得尊严、自我表达的权利,不同规模、不同行业的组织和团体都能获得尊重、公平发展的机会。如果硅谷没有接受年轻的乔布斯(S. Jobs)和沃兹尼亚克(S. Wozniak)

这样另类的创业者,苹果公司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样子^[23]。正如卡恩(B. Kahn)^[24]在书中所说,对陌生人的宽容和对平庸的不宽容是伟大城市的特征。在中国现阶段的城市更新中,当务之急是建设包容性住房体系,在核心地段配建人才公租房和青年驿站,结合“城中村”和老旧街区的更新改造,保留低成本的“城市落脚点”,构建“一张床、一间房、一套房”的多层次租赁住房体系,守护城市的“包容度”。在社会关系和文化上,营造一个宽容失败、尊重差异的社会文化氛围,让不同地域、不同身份、不同背景的人才都能找到归属感。

3.5 对标国际标准,打造类海外的“国际化服务社区”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既要立足中国各地的实际,也要有国际视野。要吸引全球顶尖的科学家和跨国公司高管,必须提供与其原籍地无缝衔接的生活环境和公共服务。新加坡在规划纬壹科技城时,同步引入了世界级的国际学校、高端私人诊所和多宗教的活动场所。其社区服务中心提供多语言服务,使得外籍人才举家搬迁没有任何后顾之忧,真正实现了“落地即融入”。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需要类海外的“国际化服务社区”,引入具备国际商业保险结算功能的医疗机构和高品质国际学校,提升社区办事窗口、路牌标识、生活APP的双语化水平,营造“像家一样”的软环境。

4 结论

本文从创造力人才视角出发,围绕地方品质与新质生产力之间的关系,构建了“创造力人才—地方品质—城市更新—新质生产力”的分析框架,系统阐释地方品质在新质生产力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机制及其实现路径。在创新驱动发展背景下,创造力人才已成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而其区位选择逻辑的转变,使地方品质由传统的城市发展附属条件转变为影响创新要素流动与集聚的关键变量。在新型

城镇化新阶段,城市更新在提升地方品质方面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城市更新规划和实践中,要从空间更新向环境重构转型,构建以创造力人才为导向的城市品质体系,强化前沿知识创造能力,完善创新基础设施布局,并培育多层次创业生态系统,从而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持续支撑。同时,在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要将地方品质作为重要维度纳入发展框架中,促使城市更新和新质生产力发展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

本文的研究从空间与环境视角拓展了新质生产力研究框架,未来研究可进一步结合实证数据,对不同城市类型与发展阶段下地方品质作用机制进行比较分析,以深化相关理论与实践探索。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1] 王伟光,丁媛. 战略性技术创新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非线性影响研究——基于自强化与他强化的双重视角[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26(1): 88-101.
WANG Weiguang, DING Yuan. Nonlinear effects of strategic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n enterprise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evidence from the dual perspectives of self-reinforcement and external reinforcement[J]. Comparative Economic & Social Systems, 2026(1): 88-101.
- [2] 李胜兰,郑威元. 创新驱动政策、创新资源流动与新质生产力发展——基于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的实证检验[J]. 南方经济, 2025(11): 20-43.
LI Shenglan, ZHENG Weiyuan. Innovation-driven policy, innovative resources flow and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empirical test based on the national innovative city pilot[J]. South China Journal of Economics, 2025(11): 20-43.
- [3] 邵传林,刘登晖. 面向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产业政策创新与调整[J]. 产业经济评论, 2026(1): 5-25.
SHAO Chuanlin, LIU Denghui. Innovation and adjustment of industrial policies oriented towards

-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J]. *Review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2026(1): 5-25.
- [4] 原磊. 制度基础与运行机制协同: 新质生产力导向的生产关系研究[J]. *当代经济研究*, 2026(3): 5-17.
YUAN Lei. Synergizing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 and operational mechanism: a study on production relations oriented toward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J]. *Contemporary Economic Research*, 2026(3): 5-17.
- [5] 唐健, 田甜. 城市更新中土地政策目标及政策工具的演变分析——以广东“三旧”改造为例[J]. *中国土地科学*, 2024, 38(9): 1-10.
TANG Jian, TIAN Tian. Evolution analysis of land policy objectives and policy tools in urban renewal: a case study of the “three olds” renewal in Guangdong[J]. *China Land Science*, 2024, 38(9): 1-10.
- [6] 郑时龄. 关于上海城市更新的思考[J]. *建筑实践*, 2019(7): 8-11.
ZHENG Shiling. Reflections on urban renewal of Shanghai[J]. *Architectural Practice*, 2019(7): 8-11.
- [7] GUILFORD J P. Some misconceptions regarding measurement of creative talents[J]. *The Journal of Creative Behavior*, 1971, 5(2): 77-87.
- [8] ASHEIM B, HANSEN H K. Knowledge bases, talents, and contexts: on the usefulness of the creative class approach in Sweden[J]. *Economic Geography*, 2009, 85(4): 425-442.
- [9] 鲁小彬.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流动机制探析[J]. *南京社会科学*, 2004(1): 37-42.
LU Xiaobin. An exploration and analysis of nowadays Chinese intellectuals' social flowing mechanism[J]. *Nanjing Social Sciences*, 2004(1): 37-42.
- [10] 毕玉才, 刘勇. 东北振兴如何突破围城[N]. *光明日报*, 2016-12-26.
BI Yucui, LIU Yong. How to break through the siege in the revitalization of Northeast China[N]. *Guangming Daily*, 2016-12-26.
- [11] 郑江淮, 孙冬卿, 戴玮, 等. 全球发明人才流动网络空间结构的多极化变迁[J]. *财贸经济*, 2023, 44(10): 109-125.
ZHENG Jianghuai, SUN Dongqing, DAI Wei, et al. Multi-polarization of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the global inventor mobility network[J]. *Finance & Trade Economics*, 2023, 44(10): 109-125.
- [12] 黄海刚, 曲越, 连洁. 中国高端人才过度流动了吗——基于国家“杰青”获得者的实证分析[J]. *中国高教研究*, 2018(6): 56-61.
HUANG Haigang, QU Yue, LIAN Jie. Do China's top talents flow in an excessively high speed - an empirical analysis for job mobility of distinguished young scholars of China[J]. *China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2018(6): 56-61.
- [13] 习近平.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N]. *光明日报*, 2024-02-01.
XI Jinping. Xi Jinping stressed during the 11th collective study session of the Political Bureau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new productive forces and solidly promot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N]. *Guangming Daily*, 2024-02-01.
- [14] 卡尔·马克思,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447.
MARX K, ENGELS F. Selected works of Marx and Engels (volume 1)[M].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2: 447.
- [15]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3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0.
XI Jinping. Xi Jinping: the governance of China: volume 3[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2020.
- [16] 习近平. 在科学家座谈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20-09-11.
XI Jinping. Speech at a symposium with scientists[N]. *People's Daily*, 2020-09-11.
- [17] FLORIDA R. What draws creative people? Quality of place[EB/OL]. (2012-10-11) [2026-03-09]. <https://urbanland.uli.org/economy-markets-trends/what-draws-creative-people-quality-of-place#:~:text=Variety%2C%20stimulation%2C%20and%20an%20atmosphere%20of%20tolerance%20help,afford%20to%20be%20choosy%20about%20where%20they%20live>.
- [18] 国家知识产权局. 国家知识产权局2024年度报告[R/OL]. (2025-08-27) [2026-03-09]. <https://www.cnipa.gov.cn/col/col3562/index.html>.
China 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Administration. CNIPA annual report 2024[R/OL]. (2025-08-27) [2026-03-09]. <https://www.cnipa.gov.cn/col/col3562/index.html>.
- [19] ARORA A, FLORIDA R, GATES G J, et al. Human capital, quality of place, and location[R]. Pittsburgh, PA: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2000.
- [20] 林善浪, 凌家慧, 林泽宇. 以品质为导向的新型城镇化及其创造力经济效应[J]. *区域经济评论*, 2025(1): 62-72.
LIN Shanlang, LING Jiahui, LIN Zeyu. Quality-oriented new urbanization and the creative economic effect[J]. *Regional Economic Review*, 2025(1): 62-72.
- [21] STEPHAN P, SCELLATO G, FRANZONI C.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for PhDs and post-doctoral scholars: what does (and does not) matter[J]. *Innovation Policy and the Economy*, 2015, 15(1): 73-113.
- [22] FELDMAN M P. The entrepreneurial event revisited: firm formation in a regional context[J].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 2001, 10(4): 861-891.
- [23] FLORIDA R, MELLANDER C. Rise of the startup city: the changing geography of the venture capital financed innovation[J]. *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 2016, 59(1): 14-38.
- [24] KAHN B M. Cosmopolitan culture: the gilt edged dream of a tolerant city[M].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2002.